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

李澍田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集



二集 李澍田 主编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特邀编辑：郭殿忱

长 白 丛 书 (二集)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

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 李澍田 主编

金恩晖 梁志忠 校释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工商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1988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统一书号 ISBN 7-80520-050-2/K·33 定价 3.70 元

《长白丛书》序

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同志，悉心专研历史，关心乡邦文献，于教学之余，搜罗有关吉林的书刊，上自古代，下迄辛亥，编为《长白丛书》，征序于予，辞不获命。爰缀予所知者书于简端曰：

昔孔子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说者以为：“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因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缺乏必要的文献，历史研究便无从措手。古代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属，久已风行海内外，家传户诵，不虞其失坠，而近代文献往往不易保存。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曾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注意，于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曾详言之。然而，保存文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贵远贱近，习俗移人，不以为意，随手散弃者有之。保管不善，毁于水火，遭老鼠批判者有之。而最大损失仍与政治原因有关。自清朝末叶以来，吉林困厄极矣，强邻环伺，国土日蹙，先有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继有军阀割据，九一八事变后，又有敌伪十四年统治，国土沦亡，生民憔悴。在政权更迭之际，人民或不免于屠刀，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命运。时至今日，清代文书档案几如凤毛麟角，九一八以前书刊也极为罕见。大抵有关抨击时政者最先毁弃，有关时事者则几无孑遗。欲求民国以来一份完整无缺地方报纸已不可能，遑论其它。

建国以来，百废俱兴，文教事业空前发展。而中经十年浩

劫，公私图书蒙受极大损失，断简残篇难以拾缀。吉林市旧家藏书，文革期间遭到洗劫，损失尤重。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复兴，文运欣欣向荣，在拨乱反正的号召下，由陈云同志领导，大张旗鼓，整理古籍，一反民族虚无主义积习，尊重祖国悠久文化传统，为振兴中华，提供历史借鉴。值此大好时机，李澍田同志以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广泛搜求有关吉林之文史图书，不辞劳苦，历访东北各图书馆，并远走京沪各地，仆仆风尘，调查访问，即书而求人，因人而求书，在短短几年期间内，得书逾千，经过仔细筛选，择其有代表性者三百种，编为《长白丛书》。盖清代中叶以来，吉林省疆域迭有变迁，而长白山钟灵毓秀，巍然耸立，为吉林名山，从历史上看，不咸山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明确记录，把长白山当作吉林的象征，这是合情合理的。

丛书中所收著作，以清人作品为最多，范围极其广泛，自史书、方志、游记、档案、家谱以下，又有各家别集、总集之属。为网罗散佚，在宋、辽、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又以文献征存、史志辑佚、金石碑传补其不足，取精用宏，包罗万象，可以说吉林文献的总汇。对于保存文献，具有重大贡献。

回忆酝酿编余之际，李澍田同志奔走呼号，独力支撑，在无人、无钱的条件下，邀集吉长各地的中青年同志，乃至吉林的一些老同志，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众志成城，大业克举。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先进经验，培养出一支坚强队伍。这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个范例。

我与李澍田同志相处有年，编订此书之际，澍田同志虚怀若谷，对于书刊的搜求，目录的选定，多次征求意见。今当是书即将问世之际，深喜乡邦文献可以不再失坠，故敢借此机会聊述所怀。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要从祖国的悲惨往事中，培养爱国家、爱乡土的心情，激发斗志，为四化多作贡献。也殷切希望读此书

者能够体会到保存文献之不易，使焚琴煮鹤的蠢事不要重演。

当然，有关吉林的文献并不以汉文书刊为限。在清代一朝就有大量的满、蒙文的档案和图书，此外又有俄、日、英、美各国的档案和专著，如能组织人力，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理，提要钩玄勒成专著，先整理一部分，然后逐渐扩大，这也是不朽的盛业，李君其有意乎？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吉林陈连庆 谨序

总目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十四)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一四七)

附永吉县乡土资料……………(一七八)

目 录

前言	(1)
关于新史料《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	(8)
序	(14)
新增纂辑《志典全书》原序	(14)
总纂、纂修者名单	(15)
《志典全书》目录	(16)
卷一	(17)
卷二	(60)
卷三 (存目, 稿佚)	(100)
卷四	(101)
卷五	(108)
卷六	(136)

前 言

承蒙长白丛书主编、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教授的鼓励和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长白学圃》编者郭殿忱同志的鞭策，将我和梁志忠同志校释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及与其相关的《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又名《永吉县乡土志》）两书合为一册，作为长白丛书之一，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李澍田等同志出于爱国家、爱乡土的至诚，对乡邦文献广为搜求，精心筛选，并择其要籍标点、校释出版，实为推动我省地方史志研究、造福于后人的盛事，对于他们这种保存地方文献的义举，我无限钦佩，更衷心感谢！此外，在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张凤桐、王华东同志，特别是张凤桐同志曾予大力协助，在此并致谢忱。

本书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我和梁志忠同志编辑出版的《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一书的基础上经取舍和修订而成的。现将该书的成书过程做一介绍。

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因受到王重民教授的影响和启迪，对目录学和地方志发生了兴趣。记得，当有一次先生问及我的籍贯，我答以吉林人时，他微笑着说：“我这个河北人，对你的家乡还有一层感情呢！”王先生指的是，他在北师大毕业以后，曾受人委托，亲自参加过吉林省的《永吉县志》的编撰工作。这部《永吉县志》于一九三一年编定，至今仍然是我省现存的一部很系统、很完整的县志，其规模、内容、字数仅次于《吉林通志》。由于王先生曾对东北及吉林省、特别是永吉县的地方史料进行过广泛的涉猎和系统的整理，因此，当我同他谈及我的家乡历史、风情时，他对举凡我省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军事、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等方面的状况，皆如数家珍。仅仅这一点，就不能不使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吉林人感到惊讶与敬佩，同时下了决心，向王先生学习，也要搞好地方志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的，至少要搞好对自己家乡的地方志的整理与研究工作的。

一九六一年，我到吉林省图书馆工作，有一段时间得以负责整理馆藏的全部地方志，并曾多次就地方志的版本、著录和目录编排等问题写信向王先生请教。先生无论教学多么繁忙，都拨冗回信，有的信竟长达二、三千字，在地方志研究中，王先生认真地解答我的疑难，给我以多方面的开导与指教，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一九六五年，我从馆藏未经整理的线装书中发现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稿本，这可以看作是现存最早的《永吉县志》，它的被发现，恰恰可以和王先生曾参与编撰的《永吉县志》相为补充，同时对整个吉林省地方志的整理和发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我沉浸在吉林省地方志研究中去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对地方志和《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整理和研究也不得不被迫中断。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又恢复了这项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完成了《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史料校释》一书的初稿，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被吉林省图书馆学会推荐参加吉林省社会科学报告会，这部专著的初稿获得了这次科学报告会所颁发的荣誉证书。在此期间，又写出了几篇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有的在中国图书馆学会科学讨论会上作了交流，有的在国内外一些刊物上发表。其中《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兼对日本学者有关研究史料的订正》一文，发表后得到了日本川久保悌郎教授的热情鼓励。我的文章本来是根据地方志中的史料，对川久保教授撰写的关于清代人参采捕制度的一篇论文的质疑。川久保教授襟怀坦荡，

实事求是，及时来函诚恳地肯定了我对他的论文所作的一点小小的订正。一九八一年七月末，他作为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访华团成员，曾专程来长春停留，与我晤面，交流有关中国地方志和清代东北史研究的问题。这位七十高龄的日本著名学者学识渊博，虚怀若谷，热情地赠给我一批他写的关于清代东北史的研究成果，对东北地方史志的研究和《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且表示了对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这一研究课题的高度重视。他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在日本学术刊物《东方学》第六十六期上发表论文《新史料〈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全面地介绍和肯定了我的这项研究成果。通过同川久保教授的交往，我感到就学术问题来讲，我对他的那篇论文所提出的一点订正意见固然可能对他或多或少有所补益，但就学风和品格来讲，这位老先生那种为追求真理而一丝不苟、为服从真理而谦虚认真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向他学习的。我们伟大的祖国，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其中包括丰富的地方志遗产，使各国学者产生了研究的兴趣，这是令人高兴的事。今后，应该加强这种国际友好的学术交流，使中国地方志遗产对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讲到异国学者对我国东北地方史志的研究和利用问题，我还不得不提到今日苏联史学界的某些文章和著作。在苏联有一些自称“汉学家”、“史学家”的人物，对于包括地方志在内的中国历史文献，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历史文献，往往采取了断章取义的不严肃的态度。在他们所谓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煞费苦心地图“证明”自古以来就一直属于中国的城镇、土地、山川、资源和世世代代劳动、生息在这里的中华各族人民，竟然不是属于中国的。

比如，我曾读到过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格·瓦·麦利霍夫著的《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一书，该书于一九七四年

由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大量地却又歪曲地引用了我国清代十七世纪以来编纂、刊行的正史、官书、地方志和私人著作，硬是要去证明一个莫须有的问题，即去证明所谓黑龙江流域不是中国的满族等民族的故乡，而是什么俄国人“直接发现”的。

众所周知，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历代的史书、地方志以及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都明白无疑地记载着和证据确凿地说明了：我国满族等民族的祖先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世世代代就是我国东北山河大地的真正主人。白山黑水自古以来就是我伟大中华民族的故乡之一，东北地区的广大领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一书的作者却不仅将黑龙江流域排除在我国清代的领土之外，还将我国清代十七世纪包括吉林、打牲乌拉地方等地在内的大片松花江流域的领土，也说成在这里“满洲人没有任何基地”，“是完全未经开发，也未并入清帝国版图的中间领土”，“国内所实行的行政区划（划分府、县等）并没有涉及到这些地方”，甚至“在1687年，不仅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而且在松花江上都没有满洲人的居民点，或者哨卡和满洲驻防军”；还断言当时的吉林、打牲乌拉地方的居民根本不是“满洲人”，“吉林地区的当地居民对满洲人不怀好感”；他把清代正式任命的打牲乌拉总管及其辖下的八旗（上三旗、下五旗）常年执行清廷的采捕任务，说成只是在有一个年头，康熙皇帝玄烨曾“利用属于希特库管辖的吉林当地猎户来运输粮食”，说“东北各部落进‘贡’”，只是为了“能够到盛京和北京进行广泛的互市”，而不是作为清朝所专设的采捕机构去履行自己的缴纳义务，等等。

吉林打牲乌拉地区及松花江流域，位于黑龙江以南、我国东北的中部，不仅在十七世纪而且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中国各王

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以清朝而言，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记载，早在皇太极时代，“本署旗仆，系我朝太宗文皇帝御基山来本处，以围猎貂皮、刨挖人参，进宝纳贡。”皇太极亲自下过特旨：“乌拉系发祥之胜地，理宜将所遗满、汉旗仆原属，一脉相关，就在乌拉设署、安官，即为一枝。捕贡兵丁，由都京总管内务府分司节制，不与驻防衙门干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明白而详细地记载了：打牲乌拉地方有清以来即为中国的版图，而根本不是什么“未经开发，也未并入清帝国版图的中间领土”。清初，固然未在打牲乌拉地方划府设县，但早在顺治、康熙年间就已经设立了由总管内务府直接管辖的总管衙门，该衙门的居民主要是满族、汉族人民，担负着向清廷缴纳各种贡品的义务，……总之，从吉林省地方志遗产中，字字句句都反映出有清以来吉林打牲乌拉地区乃至其以北的黑龙江流域一直同整个中国的版图血肉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事实。这铁的事实，真切的记载，正是我国东北地区自从“辽、金崛起，遂为内地”的历史延续的见证。麦利霍夫的著作尽管洋洋数十万言，旁征博引我国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历史文献数百种，但处处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开了世界史学界歪曲史料的学风的先例。

我们于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一书是一部学术性的校释著作，无论是研究性的论文，还是所校释的地方志，所搜集、整理的地方史料，都是从中国地方志和我国东北地方史的研究目的出发的。那部著作出版以后，即受到国内外许多人士的肯定和鼓励。据有关同志回忆，原吉林省省长栗又文同志生前“特别欣赏《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一书，称赞金恩晖同志的发现和整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工作，是对东北及吉林省地方志研究所作出的成绩。栗又文同志曾长期将这本书置于案头，时时翻检，栗老曾向一些领导同志去推荐此书，并希望一些有关领导对象金恩晖同志这样有志为编史

修志而艰苦工作的同志，要给予支持，关心。”（引文见高甫：《斯人永逝，深情长存——忆栗又文同志》，《吉林史志》1985年第1期）。吉林省地方志方面的这些研究成果，还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我曾多次收到国际亚洲研究会的邀请信，邀请我参加一九八四年七月在香港召开的第六次国际亚洲学术讨论会。该研究会在给我的来函中说：“您在一个特定学术领域里的研究成果，被我的同事们作出了是具有独到之处的评价。”并指出：“作为中国学者以新史料论证满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您的工作将会得到高度的评价并且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介绍上述一些情况，无非是想说明，无论是老一辈革命者、关心地方文史的领导，还是国际学术界，对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等吉林省地方志都是极为重视的，因而我们进行这项古籍整理工作是有现实意义的。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系云生修、莫喜一八八四（光绪十年）纂，吉林省图书馆藏稿本。原稿未有标点，我们作了标点和分段的工作。在整理时，力求忠实原文、原字，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明显的笔误，对于某些人名、地名、史实、类目，力所能及地作了注释，为将原书稿同所作的注释相区别，凡注释文一律用楷体字排印。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又名《永吉县乡土志》），系据辽宁省图书馆所藏光绪十七年（1891年）的稿本排印，新加标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卷三亡佚，但据该书目录可知，卷三的内容应为“贡江、贡山、五官地、喀萨哩、凉水泉”，而这部分内容恰恰在《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中记载颇详，似可补《志典》一书的空白。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和《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这两部地方志无论就纂修时间，还是就其内容和价值而言，在现存的我省

方志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受到了日本和亚洲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了加强中日两国学者们学术交流，汲取日本学者研究我国东北史，特别是吉林省打牲乌拉的历史研究成果，本书将日本学者川久保梯郎教授论文《新史料〈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由刘晓宁、吴文献两同志校译成中文，供读者参考。

金恩晖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于长春

关于新史料《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

〔日〕川久保悌郎 教授 著

清朝把满洲特产如人参、东珠、鲟鱼、鳊鱼、鲈鱼、松籽、蜂蜜等做为贡品(其中一部分被用做祭品),由清室(内务府广储司)征收;这种采集做为官方的独占事业经营;其官署设置在吉林乌拉(吉林)以北80里的打牲乌拉(乌拉街)。这也就是所谓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对这一满洲的独特机构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几乎是空白①;关于它的组织构成、管辖范围、业务内容等也有许多不明瞭的地方。我曾在涉及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论文②中谈到了此机关的存在,并论述过其主要任务是人参的采集。不料在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天,承蒙中国吉林省图书馆馆员金恩晖先生指出了错误,并予以严肃的批评指正③。金先生准确地论述了该衙门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东珠和其它贡品的采集,而人参的采集即便是经营了也只不过是极其次要的④。顺便说一句,最有力的和决定性的论据,我想也就是在这里所要介绍的金先生所发表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我不得不直率地承认,金先生的批评和斧正是非常恰当的。回顾当时在起草论文时,无意识地偏离了主题的角度,在已出版的许多文献中也因没能充分利用《清会典事例》检索,因而产生了错误,在此愿做深刻地反省。

至于本书,已有金先生本人著的详细介绍性的论文:《谈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四期)及金先生与梁志忠先生合编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校释》。后者与《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校释》及《清代

打牲乌拉地方有关史料辑》⑤一起被收入《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辑》（《中国地方志丛书、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十九 1981年12月），也许是画蛇添足，下面就以金先生的介绍与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新介绍一下，并略抒己见于一、二。

本书是在一九六五年吉林省图书馆馆藏未经整理的线装书库中发现的。因缺乏入藏记录，对此书的入藏来源已无从查考。首先，就其装订而言，系以清代公文用的毛边纸墨写。印面长33公分，宽19.4公分。每面十行，每行写满字不等。现存第一册55页（卷首6页、卷一49页）；第二册48页（卷二）；第四册51页（卷四8页、卷五29页、卷六14页）；计三册、共154页。缺第三册（卷三），就其内容来说，（参照后出目录）实令人可惜。该书卷一、卷五、卷六的前面分别有“志典全书卷一”、“志典全书卷五”、“志典全书卷六”等字样。现存三册的封面都写有“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字样，并盖官防印鉴。

其次，就其内容来看，卷首有两篇序文，有该书总纂官以下19人名单及分卷目录。在名单中缺该书的监修官（即总裁官），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篇序文未加标题，又无撰写人名，也未写完，仅存一面。但此序却极为重要。金先生也极为重视此序文的重要价值。以此为线索得知本书的初稿是编纂《清会典》时，该衙门向朝廷呈报的材料。序文中引用了“会典之矣，以彰编修之律，而启相传于后”。这正是指清朝皇帝载湉于光绪九年谕令各有关堂官督饬司员，悉心编辑《清会典》之事。同时对于撰书者举出了二、三条理由，论证了其为当时在任的打牲乌拉总管云生所写。云生，字奇峰，打牲乌拉正白旗人。其先人由京总管内务府分驻乌拉，久居此地。以太学生入署充差，授笔帖式。升为仓官、骁骑校，后升为翼领。由于偶然奉旨开河捕珠，巡历了松花江、黑龙江及其它各河流，取得了采集东珠的成绩。光绪六年当上了乌拉的总管。光绪二十七年四月转为伯都讷副都统，次年歿：